



臺灣天文臺
70年



我在 天文臺的日子

採訪/劉愷俐、張桂蘭

我從很小就靠著看哥哥的一本書學著認星星，在日本讀中學時，從報上看見「天文觀測同好會」成立(昭和十六年，1941年)，就寫信回來報名參加了。15歲中學三年級時回來臺灣，我是這個學會最年輕的會員，那時會員大部份是日本人，臺灣人只有2、3位，就是從那時開始我養成每周六晚上到中山堂天文臺觀星的習慣。

昭和十三年(1938年)，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新生報的前身)捐贈一架四吋口徑的望遠鏡(這架日本GOTO10公分望遠鏡目前展示在天文館一樓)，這架望遠鏡不用電，每次使用時就要把重錘拉上去，用重力帶動擒縱轉子再帶動赤道儀，這樣追蹤還蠻準的喔！臺北市役所(市政府)便著手在臺北公會堂(中山堂前身)四樓屋頂增建一小型天文臺圓頂，昭和十四年



蔡章獻

1947~1963
中山堂天文臺臺長
1963~1991(退休)
圓山天文臺臺長



辦公桌前的蔡臺長



1978年星象館開工祭典，蔡臺長與同仁上香祈福。



1980年7月15日蔣總統經國先生參觀天象館。



1982年國內儀器展示會廠商向蔡臺長介紹4吋改良反光鏡



1990年蘇聯天文學家來訪

(1939年)落成，那是臺灣最早的天文臺，直徑約3公尺大小的天文臺，圓頂也是自日本訂製運來的，儀器安裝時我還是個學生，都是日本人做的，這天文臺主要就是開放給民眾參觀用。

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臺灣光復後，「公會堂」更名為「中山堂」，原天文臺的日籍管理員隨日軍撤回日本。國民政府到處尋找天文人才，氣象局很想向市政府爭取那架望遠鏡，便寫信請懂天文的我從大陸回來，以氣象局天文科技佐的職位任用，薪水是700元，那年是民國36年，我22歲。六月便和天文科另外兩位同事到天文臺上班，那時沒有辦公室，就向中山堂借四樓樓梯邊的房間充當。兩個月後這兩位同事因為對天文沒有興趣便回局裡去了，市府也曾派一個人支援，但僅僅半年也離開了，我就一個人在這裡一待16年。那時天文臺尚歸屬於北市府社教科，由氣象局派人管理，市府則負責出錢修繕，名義上是兩個單位合作管理。那時的政府很窮，我一個人有時又忙不過來，我特別去拜訪了當時的社會菁英如同大的林挺生、教育局長黃啓惠、婦女會會長、報人、藍蔭鼎...等，尋求支持並擔任發起人。37年「臺北市天文同好會」(臺北市天文協會的前身)成立，開始時有30多位會員，任天文臺的顧問，出錢出力。民國38年，上海佘山天文臺高平子來臺灣，氣象局聘為技正，擔任天文同好會的顧問。

我拿省氣象局的薪水，可是卻常以市政府的立場、以同好會的名義發布天象新聞，和氣象局關係越來越不好，後來省氣象所有意接收中山堂天文臺，我參加省議會開會時站在市政府的立場公開表示反對意見，因為對於天文臺的使用市府是重在社會教育，而省氣象所則偏於觀測記錄，這件事讓省氣象所很不高興，準備將我調回去，我去請省議員幫忙，事情才平息。

中山堂天文臺每週末晚上開放給民眾觀測，後來參觀的民眾越來越多，有一次看火星，人潮甚至排到中華路去，類似的情況再再造成中山堂管理的困擾、加上那時的市中心—中華商場、西門町一帶日益繁榮，光害越來越嚴重，才有後來遷建圓山天文臺的計畫。

當時我就騎著腳踏車四處勘察，最後士林圓山因為位置較高、交通方便而獲選，期間還曾因為圓山飯店有意見而一度遭受中央的反對，因為圓山飯店不願意分享水源，天文臺只好在山邊自鑿深水井，市府並配合將上山的路燈改成鈉光燈以降低光害。

圓山天文臺在1963年落成，在教育與觀測並重的原則下，除了對市民開放外還會不定期舉辦巡迴教育、研習活動，是臺灣許多天文愛好者的啟蒙之地。天文臺也添購了不少觀星儀器與星象儀，有名的西村16吋(41公分)反光赤道儀就是日本國寶級的磨鏡師木邊成磨的作品(右圖)。還有1973年安裝的25公分折光赤道儀，這些都是很好的望遠鏡。



西村16吋反光赤道儀

太陽黑子的繪圖記錄更是早在民國36年進入



中山堂天文臺時期便開始了，因為我認為它是天文觀測記錄中最容易做的事，雖然找不到人教，就自己找書參考自己學，就這樣畫了20年，再來是阮國全、陶蕃麟....一棒接一棒，到現在太陽黑子記錄都還是天文館的重點研究專題。另外，如變星觀測(發現麒麟座的新變星)，還有觀測彗星像池谷-關，記錄位置。

後來圓山一帶光害也是越來越嚴重，可是天文臺是臺北市政府的單位，也不能設得太遠，最後才會遷建至基河路，就是現在的天文館。(整理/ 劉愷俐)

編註：為感念蔡章獻對臺灣天文的貢獻，旅美天文學家邵正元在1978年12月30日將哈佛大學Agassiz Station 發現的2240號小行星以TSAI來命名。而邵前輩已於2005年11月辭世。

天文科學教育館開館十周年感言—好，還要更好

文/ 阮國全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四日第一期開館，同年七月二十日全面開館，到現在已經過了整整十年，回想起民國八十年本人奉調接任臺北市立天文臺擔任臺長後，除了例行的天文教育和研究工作外，最大的任務就是籌劃和興建天文科學教育館。

天文館的建設歷經用地取得、都市計畫變更、規劃、預算編列、招標到地基開挖、興建，以至於完成，點點滴滴至今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值得一提的是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底組織編制經議會三讀通過，十一月七日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正式成立，由陳水扁市長主持揭幕並布達本人為第一任館長，但編制陳報考試院需要時間，新進人員無法進用和訓練，而開館所需追加預算也還在議會審議，八十六年初面臨開館和正式營運，所幸這麼大的壓力在市府各單位的配合協助，以及所有員工和義工全力以赴下，終於順利克服，並獲得不錯的反應。

八十六年宇宙劇場和展示場開放後，四樓宇宙探險設施開始正式規劃和興建，這麼一座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軟硬體工程，既為展示場一至三樓的延伸，更是獨立運作的設施，也因此必須慎重的規劃設計和施工。宇宙探險設施終於在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日由馬英九市長主持開幕啓用，天文館所有軟硬體設施終告全部完成，前後歷經十餘年的時間，天文館從無到有，到完成，到開放，這時也到了本人該休息和交棒的時候了，因此本人終於可以在九十二年年初順利退休。

想到當年開館後擬定的經營管理目標，近程目標「完成營運的穩定與成長」，中程目標「順利完成四樓宇宙探險設施加入開放和營運並發展網路教學」，而中長程目標「希望走向永續經營，更新，研究，發展成為天



1957-1958年間，中山堂天文台成立臺北人造衛星觀測隊，蔡章獻擔任隊長，此為史密斯松寧天文臺的感謝狀，表彰其貢獻。



阮國全

1973~1986

推廣展覽組技士

1991~1996

圓山天文臺臺長

1996~2003(退休)

臺北天文館館長



1984年與蔡臺長赴美考察天文科學館設施



2002年天文館宇宙探險設施
開放



邱國光

1980~1991

推廣展覽組技佐

2003~

現任臺北天文館館長



邱館長在天象館展覽場導覽
解說，



邱館長攝於天象館



1980年天象館開幕，天文臺
全體同仁合照，獨缺攝影者
陶蕃麟。

文教育中心」，值此開館十周年紀念的日子，雖然已退休近五年，仍衷心期待天文館永續經營，好，還要更好，茁壯還要更茁壯。(2007/05)

文/ 邱國光

座屋頂呈圓形的建築物，遠眺像是一顆龍珠，聳立在圓山大飯店前，那就是臺北市立天文臺，簡稱圓山天文臺，民國七十六年因哈雷彗星的出現，使小小的天文臺遠近馳名，這是我成為正式公務員第一個服務的地方。

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以天文氣象職系委任三職等任用報到，籌備天象館開放事宜，由當時市長李登輝先生主持剪綵。在天象館裡可以參觀天文模型儀器，了解天文現象，還有全國最大的星象廳正式對外開放，因為我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服務時，有操作過美國製星象投影機及製作星象節目的經驗，所以能駕輕就熟的操作全國最大的日本製星象儀。星象廳有230個傾斜式的座椅，在直徑十六公尺圓形銀幕下，以星象儀模擬出夜晚的星空，白天也可以欣賞到滿天的星斗，轟動全臺灣，連蔣經國總統也在李登輝市長陪同下，進入星象廳欣賞由我親自手動解說演示的星象節目，蔣總統觀賞完後走向控制臺和我握手嘉勉致意，帶給我無比的欣慰。

為吸引更多的民衆觀賞模擬的星空，從手動口述改成自動錄音節目形態放映，最初編寫節目劇本、配音、製作幻燈片和放映程式編製，全部流程由我一手包辦及策劃，經同仁的協助才能順利推出精彩的星象節目，四十分鐘的節目每月更換一次，後來因慕名來參觀的民衆及學校團體愈來愈多，業務量大增，常態的星象節目只好改為每季更換一次。每逢七夕和中秋，由我編劇製作推出二十分鐘的特別節目，並配合25公分大型天文望遠鏡的開放，一個晚上就可吸引二、三千人帶著朝拜心情，湧進小小的天文臺參觀，盛況空前的人潮吸引媒體爭相報導，儼然成為七十年代天文教育推廣的聖地。

六十九年至八十年我在天文臺推廣組十二年的時光，職務從技佐、技士到推廣組代理組長，為了推廣天文教育舉辦過無數次的研習活動，擔任過大學、高、國中、小學天文社團的指導老師，也常到全省各地利用父親送我的一套照像器材拍攝星空，或講演宣導天文知識，練就一身如何行銷天文教育的功夫技巧，經驗的累積使我能順利的轉換跑道，於八十年一月被商調到中央氣象局天文站任職，從事天文研究推廣業務。

有一天在天文站辦公時，突然接到天文館郭煌烈老同事的來電，說教育局網站上有徵館長的消息，備妥資料報名後，經由九位甄選委員的評審通過，吳清基局長的拔擢，由市長馬英九的任命，於九十二年六月二日就任為十職等館長，提出四大願景和六大目標，時至今日，承蒙同仁及志工熱忱的協助及相關企業、學術團體的支持，以致天文館的業務能正常營



運，廣獲參觀民衆的好評，上蒼給予國光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圓山天文臺、中央氣象局天文站和天文館服務大眾的機會，誠為惜福感恩。

文/ 陶蕃麟

在史波尼克掠過臺北上空的第一個夜晚，隨著家人在屋頂上看衛星，只聽到四週都響起看見了的歡呼和驚呼聲，我卻仍弄不清東西南北，只能望著滿天星斗發愣！於是，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況下，就決定要成為一個天文人。不過當時還沒有圓山天文臺，而雖然住家離中山堂很近，也不知道那兒有個中山堂天文臺。

已經忘了何時與圓山天文臺有了接觸，應該是買第一份星座盤的時候吧。而正式與天文臺打交道是民國60年的火星大接近，當時由於媒體的宣傳，8月12日入夜前的圓山天文臺已經出現了人潮。隨著夜色的降臨，人越聚越多，民衆的心情也開始浮躁，於是當晚的開放是在民衆擠破大門玻璃的情況下，提早開始的。

當時的我仍是不畏虎的初生之犢，忘了來此的目的是看火星，就自告奮勇在樓梯上協助維持參觀的秩序。忙了一夜，等人潮散盡，只見天文臺的人員在一陣交頭接耳之後，推出了一位代表怯生生的到我面前問了一句：「你是誰？」，這才有機會表明身分，而也從此刻認識了開創臺灣天文教育工作的蔡臺長，並因緣際會的成為圓山天文臺早期的志工之一。

在哪個志工的觀念還未建立的年代，只有兩員五工的圓山天文臺，已經有了一群有實無名的志工：陳正鵬、蔡鴻彰、鄭炳今、周國華與李燦芝.....。而當年的志工，如今泰半是臺北市天文協會的中堅幹部。

民國69年，擴建的圓山天文臺招募新人，慶幸自己當年選擇的是物理系，得以用技術人員的身分成為圓山天文臺的正式員工。上班的第一天，就被交代進行太陽黑子的觀測，沒有實習也沒有教育訓練，只是看了舊的記錄，就新手上路了。而太陽黑子的觀測一做就是17年，養出了一隻半「蝴蝶」(註一)，也建立了「臺北」自己的黑子平滑曲線模式(註二)。

擴建後的圓山天文臺雖然有了天象儀，可以不受天候影響的進行星象教學，但是對天文知識的傳播與新知的傳遞仍有不足，於是在舊有的天文快報外，又推出了觀測月報，預報每個月的天象並蒐集臺灣地區同好的觀測資料，提供同好交流與進行資訊的交換，不過在年鑑出版後不久就功未成身先退了。民國73年開始編印太陽黑子年報，77年出版天文年鑑；這些都隨著圓山天文臺的改建，移交給再度擴建並遷移新址的天文館。

在這段期間，火星依然很規律的與地球接近又遠離，火星觀測是圓山傳統的觀測項目，但那是蔡臺長的專長，每次看他在昏暗的小燈下描繪10公分直徑的火星圖，只有羨慕的份。民國77年的大接近，日本東亞天文學



陶蕃麟

1971~1980

圓山天文臺義工

1980~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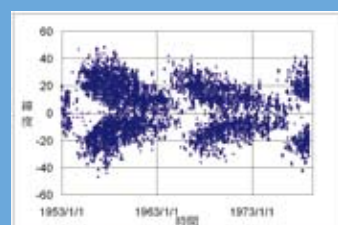
圓山天文臺研究組

1997~2005(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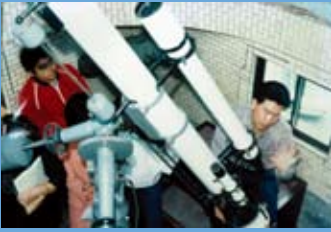
展示組組長



1979年圓山天文臺的黑子記錄
(左上795117，79代表1979年，5117代表累計的5117次觀測)。



圓山1953-1978原黑子蝴蝶圖



圓山天文臺第二觀測室太陽觀測解說



77年火星大接近，陪同日本東亞天文學會的火星專家南政次(右)進行火星的描繪與攝影觀測。



1971年火星大接近的火星觀測手稿。



陳正鵬
現任臺北市天文協會理事長

會的火星專家南政次受臺大之邀來臺講學，順便在圓山天文臺進行火星觀測。於是與張麗霞和陳培平三人共組臺北的觀測小組，陪同進行火星的描繪與攝影觀測，也見識到了甚麼叫「觀測」。

當時，每夜從火星由地平線上被看見開始，小組成員像走馬燈的在兩間觀測室與辦公室之間不停穿梭，每40分鐘輪流觀測20分鐘，而不觀測的20分鐘就要回想剛才所見的各项特徵，做文字上的補充與說明，直到火星西沉或東方泛白。而白天還是有日常的業務需要執行，回想起來那次的火星大接近真不知是如何度過的，但可以確定的是：沒有媒體推波助瀾，連天上也太平。不像剛過去的哈雷彗星媒體令全臺灣為之瘋狂。

與蔡臺長的觀測模式相比，真有天壤之別。蔡臺長的觀測像是度假的休閒活動，精雕細琢的完成一幅素描圖；而南政次博士是強行軍，快而準的掌握住重點與細節，還有持續性的變化。兩年後，南政次博士再度到圓山觀測，卻以人事全非：臺長已經換人做，火星觀測小組也已經解散，新館的規劃開始。

回頭看民國74-75年間哈雷彗星的回歸，在媒體的強勢報導下，成了臺灣地區首度的全民觀星運動，圓山天文臺的小，才被凸顯出來。來自全省各地對哈雷彗星訊息的需求，使隸屬於臺北市最基層的小單位，嚴然成為全國最受重視的哈雷彗星代言者。每天都要錄製當天哈雷彗星適宜觀測的時間與位置，好在這時已經有了「臺灣蘋果」，可以自己計算出所需要的資料，滿足各界的需求。而若沒有哈雷彗星的回歸，圓山天文臺可能就會老死於圓山，沒有後來新館的擴建與今朝的回顧了。

註一：黑子的緯度—時間變化有如蝴蝶翅而得名。

註二：黑子的消長以11年為平均週期，但因使用儀器的差異與觀測者的不同，各天文臺所獲得的數量會不一樣，但變化趨勢是一致的。

文/ 陳正鵬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成立至今，轉眼已屆十年，臺灣天文臺的的始祖為中山堂天文臺，而中山堂天文臺的催生者則是創立於民國37年3月14日，現改為「臺北市天文協會」的「臺北市天文同好會」。

回憶當初進入天文協會的過程，還真有點「歹勢！」而難以啓齒。

早期臺北市有一著名專門販賣舊書的牯嶺街，我在閒逛時無意中見到有本「天文通訊」合訂本，才知當時有個天文同好會的組織正在招收新會員。當時我還認為這種探討天文、研究宇宙的高深組織，一定需要筆試、口試等三堂會考才能入會，因此苦讀身邊僅有的兩本天文書—中華書局的「天文學綱要」和開明書局「星空的巡禮」，並經雙親反覆考問後，才敢大膽寫了封信給蔡臺長報名。



臺灣天文臺70年

在經過見面閒談後，我斗膽問臺長「什麼時候要考試？」，得到的回答竟是「不要考試，只要繳錢就好了！」，「真的！？OX@\$…」。時至今日，身為天文協會理事長的我，當接到一些天文愛好者打電話來告之想要參加臺北市天文協會，「需要什麼資格，準備那些證書資料，要不要…」，我還是會以「曾經走過」的心情，簡單的講出那“渡人無數的七字真言”——「只要繳錢就好了！」。

現在天文教育館有很完善而周詳的志工制度，不但可以協助館內的各項活動，更是志工自己學習天文的大好良機。當時天文臺每週六晚，都會舉辦天文觀測特別開放，由於臺內人手不足，因此天文協會一些「死忠」份子，加上幾所學校的「天文遊民」，到了週六下午，都會齊聚天文臺「打卡上班」。

當時為了解決晚餐，大家早就協調好帶米帶菜，到了四、五點鐘，一些女生在炊煙裊裊中切菜炒肉，偶而欠缺某些佐料，我也會以「mission impossible」的膽識，到樓下蔡臺長的廚房去「借」，再「順便」帶些青菜、豆腐與雞蛋，有時還會把桌上的土司麵包「不小心」給帶回來，就這樣圓山天文臺成了我們的圓山大飯店。到了夜幕低垂，華燈初上之際，當許多市民及一些天文老友前來觀測聊天之際，我們早已清理乾淨，披掛上陣準備「接客」。

記得當時，蔡臺長坐鎮在臺長室內，很放心的讓我們主導周六夜特別開放，我們也都以歡樂的心情，打開觀測室圓頂的天窗，啟動望遠鏡赤道儀的同步馬達，找到觀測目標、調準焦距後供來賓觀看，當來賓看到月球的坑洞、金星的盈虧、木星的衛星、土星的光環以及一些著名的雙星、星雲、星團與星系時，都會發出深深的驚嘆聲，這時我們似乎也忘記了一切辛勞，有那麼一點點「很偉大」的感覺。

當時大家都會感到很熱鬧、很興奮、很有成就感，當然也很一餓，因此在結束觀測、關門收攤後，大夥兒就會從天文臺散步到士林夜市「添加燃料」。這段三、四十年前的美好的歲月，現在回想起來一切彷彿就在昨日。

此次天文科學教育館成立十周年大慶，為了要留下臺灣天文早期開拓發展的第一手資料，「臺北星空」特別規劃採訪已退休的蔡章獻老臺長，當我帶領天文館張桂蘭、劉愷俐親赴臺長住所，聆聽這位八十多歲臺灣天文的開山宗師娓娓道來一些趣事時，自臺長眼中及語調聲中，彷彿又見到那種許久未見，赤子之心般的興奮之情。

沒有天文臺就沒有天文館，而沒有蔡臺長就沒有天文臺。在臺北市立文科學教育館十周年生日的前夕，我們除了要恭賀天文館「縱觀天宇、遨遊日月、推展天文、十年有成」外，更要感念這位「2240」號小行星的主人，臺北市立天文臺蔡章獻臺長輩路藍縷，創建臺灣天文，立下深厚基石的苦心與成就。



1986年圓山天文臺在墾丁國家公園舉辦的哈雷彗星觀測時所頒發的觀測證明書。

提供/羅麗容



建臺40週年紀念餐會。



臺北市天文協會當時一些死忠的份子，目鏡處為蔡臺長。



陳正鵬(右)與蔡臺長



當時簡陋的天文臺大廳，陳正鵬(右)與郭煌烈(左)。

文/ 蔡鴻彰



蔡鴻彰

1971年10月(大一)每週六前往圓山天文台幫忙打雜開放事宜。

1973年8月起，借住圓山天文台內，每晚有機會協助開放與觀測。

民國1977年一月起，進入公司工作，離開圓山天文台，只在開放時間前往幫忙。



1974年8月於圓山天文臺門口留影，蔡鴻彰(前排右二)、蔡章獻台長(中排左一)、陳正鵬(後排)。



在曹永杰的筆記本中，1982年臺北市天文協會天文攝影組出遊紀念。

我生於民國四十年代，當時的臺灣正值政局動盪，朝不保夕，但是有一群來自本地、大陸的天文界精英，因緣際會，組成了臺北市天文同好會，在當時的臺北市中山堂頂樓天文觀測室，推廣天體觀測活動，成員有日據時代的天文臺工作者蔡章獻先生，本地工廠老闆林挺生先生、政治家游彌堅先生、黃啓瑞先生，大陸來臺將領楊森先生、上海佘山天文臺高平子先生...等等。什麼樣的興趣讓這些背景不同的人能熱衷投入，忘記彼此的差異呢？那就是對宇宙事物的愛好了。浩瀚的宇宙讓人自覺渺小，謙虛互對。

天文臺雖僅如斗室之小，但來此聚會觀測，令人眼界開闊，心胸舒暢，頓覺人生短促，財富權勢，亦如過眼雲煙般...，臺北天文臺，教化了好幾代的愛好者，我何其幸運，成為被教化，後來亦有機會參予教化別人的一員...。

1971年我就讀臺北中山北路三段上的大同工學院電機系，因為圓山天文臺就坐落在中山北路四段圓山飯店前，從我教室就能望到，走路過去不需要二十分鐘。

我第一次拜訪圓山天文臺時，接待我的是陳正鵬先生，記得當時掏出來繳入會費的錢被發現是一張五十元的偽鈔，於是我在天文臺上的第一課是"如何鑑識偽鈔"。

當時天文臺有口徑四十公分的蓋賽式反光赤道儀天文望遠鏡。每週六晚上開放參觀，是由蔡章獻臺長，陳正鵬或盧世斌操控，感覺三位各有長才，臺長找星極快，陳兄說事如數家珍，盧先生機械與光學的技術一流，所以我就成了最早到，最晚回，週週報到的常客，如果觀眾多了，我就權充小兵，叫觀眾排隊，不可喧鬧等。

久而久之小兵磨練成班長，臺長就讓我操作全國最大的天文望遠鏡，經常面對滿室觀眾暢談星空奇景、外星人，四次元時空，可說是過癮之至。

天文臺內有個小販賣部，賣星座盤，星圖，及少見的天文圖書，也受理同好會的報名事宜。

天文臺的展示廳還只有一間教室大，除了掛圖，相片，天球儀模型，就是那張鎮臺之寶蘇州天文圖最受矚目，此外別無任何立體互動的展示項目。

1973年左右，由於一些大專天文社團常到天文臺辦活動，天文臺變成人才培育工廠，在臺長及盧先生的指導下，學生學習磨製天文望遠鏡片，打造赤道儀，在此之前天文望遠鏡都是管制進口的，自製成功還登上許多報紙版面。

1974年我有幸得到蔡臺長的信任，能住到天文臺的一小房間，從此展開了三年多以臺為家的生活，在晚上天文臺人員下班後，就可為來訪的民眾與學生開門，幫助他們一睹星空的奧秘。



在這期間四十公分反光鏡不敵潮濕氣候鍍膜氧化退光，所以換上五藤25公分折光鏡，並也將小圓頂四吋折光鏡換成五藤五吋鏡，人員編制也多了，像技士阮國全先生，技工郭煌烈先生都到任，還有幾位工友，這樣就有餘力發布新聞，編製天文通訊，也能不間斷的觀測太陽黑子，描繪火星表面，由於我對電腦電子技術比較熟悉，所以在天文計算，儀器自製修理方面比較投入。

不同於一般公家機關，晚間也隨時為民衆服務，從電話回答西邊天空出現的飛碟(金星)，至特殊天象像火星大接近，中秋例假，更是員工會員全員出動協助開放。那時蔡臺長夫人就會弄一些可口點心，慰勞大家的辛勞。

有了天文臺，天文愛好者就不斷的加入，像早期建造圓山天文臺的黃時和，林坤山，師大天文社的張景良，文化天文社的傅學海，光武工專的曹永杰，一些小學生像就讀劍潭國小的陳培華也來此，彼此透過不斷交流激盪而迅速茁壯，然後散佈開來。這些人又到各地播下天文的種子，在更廣大的土地上開花結果。

後來經由臺長的努力，政府終於撥款在圓山增建天象館，有更多空間與更豐富的内容作推廣活動，再隨著基隆河的整建完成，天文教育館又擴大遷建到基河路現址，館長也由蔡章獻，阮國全先生換到老友邱國光先生，迄今已有四十年了，相信在代代工作人員的努力工作，天文同好的支持擁護下，天文教育館會發揮更大的功能。



1983年5月，蔡鴻彰攝於救國團金山青年活動中心頂樓。



曹永杰(左)與陳培華攝於五吋攝星儀室內

記憶中的圓山天文臺



圓山天文臺全景 洪景川 攝於1999



從圓山天文臺遠眺淡水觀音山 翟振忠 攝於1982/09/15

文/ 吳志剛

圓山天文臺，一個青澀年紀的夢幻回憶。每週三下午的小週末，對三十年前的中學生而言，是看電影逛街打撞球的重要日子，對我而言，則